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0年6月　頁359～39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

高　嘉　謙*

提　　要

十九世紀末期，清廷政府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和派駐使節，奠定了海外華人作爲一個群體對象在中國外交史的意義。使節的南來，尤其凸顯士大夫階層的境外離散和文化播遷的象徵意義，形塑了早期新馬地區初步的文學規模。本文以中國派駐的使節左秉隆，及繼任者黃遵憲爲焦點，檢視他們任內創辦會賢社、會吟社、圖南社等宣教文化、推動文風的相關作爲，以及個人生產的漢詩作品裏的華人世界和形象，描述使節駐新帶動的南來文學氣象和意義。

本文因此嘗試討論和處理兩組問題：

一、使節具備官方身份，面對西方殖民勢力，以及華人移民社會所建立的異地景觀與文化想像，如何轉換爲他們的文學實踐與教化任務？使節推廣的帝國意識和建立文社傳統，如何在早期南洋殖民地和華僑社群形成一個具有描述個體生存經驗、地域意識與教化傳播的文學生產空間？

本文於99.02.15收稿，99.05.12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使節的南洋漢詩描述風土地誌和海外華人生活，記錄殖民地體驗，海外華人以什麼形式和概念進入他們眼界？領事與詩人的雙重身份，將華人移民史納入漢詩視域，因此改變了傳統宦遊文學的格局。他們對離散華人進行敘事和紀史的漢詩寫作，標誌了馬華文學現代起源的時間點——大離散的華人移民時代。

關鍵詞：使節漢詩、帝國意識、風土、左秉隆、黃遵憲、馬華文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mpire, Culture and Customs: Imperial Chinese Consuls in Singapore and Mahua Literature

Ko Chia-cian*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consulates in Singapore and dispatched consuls, a precedent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that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consuls represented the dispersal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ir arrival in Singapore, coupled with their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literary works, gave shape to early Mahua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I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wo distinguished Chinese consuls in Singapore: Zuo Binlong (1850-1924) and his successor Huang Zunxian (1848-1905). I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ways these consuls change and reshape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Mahua literature. To that end, I examine these consuls' cultural undertakings, which enriched culture and envigorated literary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at that time,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which portray the experi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following two sets of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1) The consuls we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at the fore of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and situated within the exotic landscape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established by early Chinese emigrants. How do these conditions combine to transform the consuls' literary practice and cultural mission? Furthermore, how do these consuls, through promotion of imperial awareness and establishment of social-literary traditions, shape a literary space in which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loc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an be portrayed?

(2) The consuls compos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Han poetry. In what form and conception do these literary writings document lived experience in the colony and reflect local customs and l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How do such literary works, incorporating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the terrain of Han poetry, expand and reshape the official-travel writing tradition—and mark a starting point of Mahua literature?

Keywords: Han poetry of Chinese consuls; empire; culture and customs; Zuo Binlong; Huang Zunxian; Mahua literatu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

高　嘉　謙

一、天南斯文一線存：使節與教化

一八七七年清廷政府經由駐英大臣郭嵩燾與英國外交部談判，同意中國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並由中英雙方認可的當地著名僑領胡璇澤出任首任領事。[1] 隔年領事館正式對外開館，這是清帝國在海外華人社會的第一間領事館，對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當然頗具意義。就官方立場而言，他們開始正視海外僑民的集體存在，以及僑民可以回饋祖國或爲祖國帶動的短期或長期利益。在後續討論增設其他南洋領事館階段，諸位朝廷大臣和駐外使節從海外華人捐輸可以支應朝廷開銷、籌措洋務經費、關稅效益、穩固對清廷的效忠等言論，已經看到晚清政府思

* 本文爲國科會 98 年度研究計畫 (NSC98-2410-H-002-174) 之部分執行成果。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東亞斯文自一家：東亞使節文化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 年 9 月）。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專業意見和指正。

[1] 胡璇澤成爲中英雙方的選擇，其中有許多外交與人脈關係的考量。除了郭嵩燾的推薦，胡得過英王勳章，當過立法議員。在英方不同意中國直接派任領事的情況下，胡的出線也許是一個外交折衷下的選擇。關於胡在新加坡的事蹟，詳姚楠：〈中國駐新加坡首任領事胡璇澤的得官原因和政績評價〉，《南天餘墨》（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3 月），頁 119-12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如何將海外華人納入他們外交系統的一環。[2] 雖則自十九世紀四〇年代中國苦力貿易 (coolie trade) 開始以來，輸出「華工」或「豬仔」等契約華工衍生的問題已是清政府在外交層面必須面對的海外華人議題。[3] 但在海外華人社會設置領事館和派駐使節，其外交佈局和考量卻影響甚大。這開啓中國外交史的一扇視窗，透過賣官鬻爵和召喚歸僑拉近了南洋華人跟中國的關係，卻也同時暴露出使節面對異地華人群體，在國力懸殊的現實情況下，面對殖民地政府的無能爲力。這更清楚看出清廷設置領事館背後實質的經濟效益考量，大於積極護僑的外交政治。使節透過向華僑賑災募款，和介紹推薦當地僑領捐官買爵，已成爲使節經營的「外交經濟」任務。[4]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使節的派駐，卻深遠影響左右了晚清以降南洋華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在經濟利益之外，重新理解清廷使節在英殖民地華人移民社會的功能，他們作爲清帝國使節的官方身份，以及在海外華人群體崇高的象徵意義，成爲思考和總結這些駐外使節政績和文化生產的重點。[5] 因

[2] 關於張之洞、總理衙門、薛福成等人對增設領事館的建議和考量，相關討論詳青山治世：〈晚清關於增設駐南洋領事的爭論〉，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600-618 。

[3] 關於苦力貿易的興起和影響，詳顏清湟：《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0 年 12 月）的第二、三章。

[4] 關於清廷在新加坡設領事館背後考量的經濟效益，見王振勳：〈晚清中國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的經濟考量〉，《興大人文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6 月），頁 847-870 。至於使節與賑捐募款、賣官鬻爵活動的討論，詳顏清湟：〈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年 7 月），頁 3-43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爲例》（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 年 5 月）的第三、四章。

[5] 對中國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的討論，中英著作都有觸及。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顏清湟：《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第四章。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 (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2 年 10 月）。Godley, Michael R.“China’s discove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0-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本文以中國直接派駐的使節左秉隆，及繼任者黃遵憲爲焦點，檢視他們任內宣教文化、推動文風的相關作爲，以及個人生產的漢詩作品裏的華人世界和形象，試圖描述一個使節駐新帶動的南來文學氣象。

一八八一年左秉隆抵新走馬上任，成爲首位由中國直接派駐的領事。相對之前由當地華僑領袖遴選出的胡璇澤，其意義自然不同。左秉隆 (1850-1924)，字子興，別署炎洲冷宦。曾在北京同文館教授英文，後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充任駐英使館翻譯官。左秉隆續任三屆駐新領事（每三年期滿延任），歷時十年。一八九一年他被調職轉任洽談中的香港領事館，後領事館成立未果，告假回籍。一九〇七年左秉隆再次派駐新加坡，由於國際局勢動盪，清帝國已岌岌可危，三年任滿後辭職。回顧他第一次派駐期間，倡導華文教育，推動義塾設立，成立會賢社，推動文風，培養華裔人才。另外還創辦英語雄辯會，接近受殖民政府英文教育的土生華人 (峇峇)。[6] 他投入關懷華人移民社會民生問題，頗受擁護愛戴。[7]

後來接任者爲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黃遵憲 (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人。曾任清朝派駐日本、美國、英國等地的外交官。一八九一年派駐新加坡時已升格爲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馬六甲等事務，職權擴張到馬來半島。他爲保護華僑權益與英殖民地政府產生矛盾衝突，對於華人社會則身負教化任務，創辦圖南社，每月於報刊出題和評選，倡導文風之餘，大有爲國家儲備人才之意。他任職總領事僅三年餘，一八九四年卸下職務。[8]

[6] 峇峇 (Baba)〔馬來語〕，又稱土生華人 (Cina Peranakan 或 Cina Selat)〔馬來語〕、海峽華人 (Straits Chinese) 或海峽僑生 (Straits-born Chinese)。他們是早期馬來群島華人移民與當地婦女通婚的混血後裔，主要分佈在馬六甲、新加坡、檳城和印尼等地。相對峇峇，十九世紀以降直接從中國南來的移民，則稱「新客」。

[7] 關於左秉隆政績的討論，詳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椰陰館文存》（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頁 121-127。柯木林：〈左秉隆領事與新華社會〉，《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 8 月），頁 74-80。

[8] 黃遵憲駐新期間事蹟和政績的詳細討論，詳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高維廉：〈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總領事考〉，《南洋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55 年 12 月），頁 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以上簡略的概述，我們看到左秉隆和黃遵憲不但是有豐富駐外經驗的外交官，熟悉海外華人的生態和事務，同時兼具傳統士大夫教養，及教化使命。晚清時期設置駐外使館的功能之一，包括培養外交人才。[9] 二人派駐在華洋雜處的殖民地社會，理應跟他們多年外派的域外視野有關，因此他們駐新期間的作爲和風格，對華人社會顯然意義不同。二人不但是清廷派駐南洋頗受稱譽的領事官，且是詩人留有詩集。左秉隆《勤勉堂詩鈔》(1959) 散佚不全由後人輾轉蒐集出版，寫於南洋的詩篇約二百至三百餘首，[10] 紀錄了前後兩次共十餘年駐新生涯的見聞。黃遵憲《人境廬詩草》(1911) 收集他在南洋期間的漢詩三十餘首，雖然數量不多，卻有不少名作，藉由晚清新派詩家的眼界，表徵了南洋華僑生態。

事實上，從早期朝貢關係、海洋貿易到旅行遊歷，南洋對中國而言早已不算陌生地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區域仍屬中原意識外的異域或炎荒之地。[11] 在文化播遷上，除了隨著移民入境帶來基本的生活文化習俗，一般不曾構成具有規模的文化地理。雖然商人、船員的旅行筆記早已記載這片南方地理，中

[9] 箱田惠子：〈晚清外交人才的培養：以從設立駐外公館至甲午戰爭時期爲中心〉，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頁 585-599 。

[10] 由於《勤勉堂詩鈔》只進行體例分類，未做繫年，故對其寫於南洋的詩篇判斷也有出入。其中李慶年統計約 318 首，何奕愷統計則是 241 首。對照整本詩集的篇數，寫於南洋之作已佔 4 到 5 成。數量如此龐大，歷來討論者卻不多。但有趣的是，筆者發現左秉隆〈馬來方物雜咏〉一詩卻選入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的華文課文，詳楊清龍、林玉玲編：《華文・中二》（八打靈：文化供應社， 1989 年），關於李、何二人的統計，詳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6 月），頁 96-98 。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南洋學報》第 63 卷（ 2009 年 12 月），頁 131-146 。

[11] 不過，相對西洋航線，東洋航路的遷徙相對有複雜的移民脈絡，尤其是臺灣。臺灣自明鄭、清領以來，早有流寓文人的漢文學播遷和生產。尤其康熙年間臺灣納入清版圖後，移民臺灣的形式涉及清廷政策，有「內地化」、「土著化」等不同的觀點。詳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南昌：江西高校， 1998 年 11 月）。但日本殖民時期，日本文人漢詩裏的臺灣，仍是蠻荒想像。「暫入南荒豈足云」、「絕域寒暄從此分」（籾山衣洲：〈將發東京諸公送到新橋賦此以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官吏也曾往返南洋停留、考察。[12] 但是進入詩文的描述，第一次眞正走進文人視域的，[13] 恐怕還要等到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當清廷設置使館和派駐使節，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士大夫集團，開始頻繁繞道南方海路出國考察與長駐南洋境域，他們描述與命名南洋，深入當地生活景觀，產生可能的文化比較和想像。因此，使節南來長駐，被認爲是對南洋華人社會的「再華化」(re-sinolisation) 。[14] 箇中理由，除了使節介入僑務積極培養華人的中國認同，更關鍵的一點，在於使節左秉隆、黃遵憲接續創立文社，以政治資源推動南方文教，對華人移民進行教化啓蒙，中原士人階層帶動的文學與文化播遷由此開始。對一個已經有幾代移民的殖民地華人社會而言，使節代表政治與文化的中華正統，在華人移民群體和英國殖民文化之間，形成一種「認同」和「溯源」的附加功能，自然對華人在血緣、祖籍、儒家教養、文化傳承等層面，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再華化」可能。

在此之前，新加坡只有私塾的教育規模。一八八一年左秉隆駐新，同年《叻報》出刊，文人南來旅遊、訪友開始頻繁，啓動了一個跨境的風雅交流，詩詞唱和開始透過報刊等公共領域流傳，使節主導的文社月課和作品展示，也都經由報刊宣傳刊登。整體文學風氣和教化氛圍的興起，可謂同步並行，大體

[12] 根據學者整理的資料，除了鄭和下西洋， 19 世紀 60 年代中國官吏已多次往返南洋。但大規模的民間知識群體的流寓和移居，大概要到領事館建立以後。關於訪問官吏的統計，詳崔貴強：〈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南洋學報》第 29 卷第 1 、 2 期（ 1974 年），頁 1-14 。饒宗頤：《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附錄「清季來往新加坡人物表」。

[13] 相對詩文，小說部分對南洋的想像甚早。明代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藝》以神怪歷史演義形式繼續發揮鄭和下西洋的本事。清初《後水滸傳》直接讓明遺民在暹羅建立復興基地。晚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中三位主人公則將南洋視爲避禍之地。

[14] 柯木林：〈新華古典詩文選釋〉，《石叻史記》，頁 23 。柯最新的論述處理新加坡與中國關係，強調左秉隆是新加坡華人「再華化」的奠基者。詳柯木林：〈「我視新洲成舊洲」：左秉隆與新中關係〉，《南洋學報》第 63 卷（ 2009 年 12 月），頁 109-13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看出一個由南來文人與本地士紳共同組成的「士階層」的初步形成。[15]使節與前後陸續抵達的經商、謀生、旅行、移居等形式各異的流寓者，持續以熟悉的文學技藝和形式：漢詩寫作，這些士大夫的基本教養和文化雅興，創作出馬華文學古典時期最早的樣態。文人藉由漢詩描述自身流離體驗和異地景觀，深刻紀錄了馬華文學的「南來」起源情境。從正式派駐使節到清帝國覆滅的三十餘年間，新馬兩地先後創辦了十餘份中文報刊，文人的詩文透過此公共文學建制始能浮出地表。[16]漢詩裏的南洋形象雖然顯得零碎，但逐漸清晰，並且紀錄著時代的歷史脈絡。

但新加坡最特殊的情況，卻是文學公共領域的建制及其教化功能，不能略過使節創設文社產生的影響。左秉隆在任期間先後創辦了三個團體。一是會賢社，主要以當地華人爲對象，將自己當作官派教師，以自己薪俸做獎金，每月開出課題，公布課榜，評選優異詩文。相關資訊與文章，都會公布在《叻報》。另一個運作相似的團體是會吟社，同樣是公開徵聯，但更集中於詩題聯句，在士人群體間開啓一個酬唱互動的氛圍。得獎詩聯和名單除了公布報刊，還張貼民間書院崇文閣圍牆，文學風氣隱然形成。[17]使節、文社和報刊的結合，建立起一套南洋早期的教化機制。三者連結的契機，看出了華人移民社會的文化發展規模。主筆和編輯作爲報社骨幹，都是南來知識份子，無形中肩負著跟使節相似的教化義務。[18]他們在殖民地是少數的華人知識階層，而報刊是移民社會

---

15 南來文人和本地士紳的統計和名單，詳梁元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士」階層之分析〉，《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5 年 2 月），頁 9-30 。

16 新加坡與馬來亞地區最早的中文報刊分別是 1881 年在新加坡創刊的《叻報》，1890 年在新加坡創刊的《星報》、1895 年在檳城創刊的《檳城新報》。另外還有丘菽園經營，1898 年創刊的《天南新報》。這些報刊都是當時漢詩發表的重要園地。

17 葉鍾玲：〈左秉隆與會吟社〉，《中教學報》第 27 期（2001 年），頁 115-128 。

18 以《叻報》爲例，主筆葉季允寫作的社論，多爲〈論教子弟〉、〈論報恩〉、〈論禁賭〉、〈論誠實乃爲人爲之本〉等傳統道德議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賴以傳播知識、資訊和輸出文化資源最爲重要的管道。[19] 因此當報刊作爲華人移民想像和參與的公共領域，自然成爲使節最積極運用和推動的媒介。報刊提供的資源成了凝聚華人集體意識的開始，在一個以漢字溝通的報刊界面，使節結合報刊展開的文學和思想教化，難免有著重塑認同與灌輸意識型態的意圖，尤其潛在的角力對象是西方殖民文化。

在移民社會推動傳統教化，固然是改風易俗。但教化的眞正動機，恐怕還是跟凝聚華人移民的士人階層對清廷與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有密切關係。綜觀文社的創辦與推動，參與對象往往是早期南來與土生的華人知識份子。而課榜題目和獲得刊載的得獎文章，大體不出儒家精神的教化內容。其中還涉及部分跟清廷政治相關的議題，諸如「光緒帝之婚典與親政」。[20] 這些題目對非勞動階層的移民群體顯然更有意義，進一步形塑了士人社會的基本性格。華人移民的文化意識，以及散居中國境外的整體氛圍，由此確立了某種參與或想像中國的管道。不論是儒家文化命題的薰陶，或透過這些命題的鼓吹，士人在海外社會藉由使節推動的文化活動，加劇他們認同使節具備的政治象徵意義，因此更投入參與在領事館舉辦的清帝國各式慶典，響應清朝鬻官制度，對華人正統有了某種儀式性的連結和想像。[21] 在此基礎上，領事館不只成爲了士人群體交際的公共空間，同時在殖民地建立一個帝國文化意識延伸的場所。論者經由會賢社課榜名單統計出當時的士人群體可能高達三百人之多。[22] 如此可觀的人數，說明左秉隆成功在私塾基礎上建立教化的轉型。雖然他當時也參與鼓勵興辦了不少義塾、書室，但經由課榜與報紙刊載聯榜的形式，士人群體之間的聯繫透過

19　其中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叻報》常刊載「新到圖書發售」的消息。而書籍主要來源於上海蘇州等地，且強調「多有叻地未嘗經見者，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實非鮮淺」，教化的意圖明顯。相關廣告詳〈新到各種奇書發售〉，《叻報》（1890 年 3 月 13 日）。

20　〈課卷照登〉，《叻報》（1889 年 3 月 2 日）。

21　〈萬壽無疆〉，《叻報》（1888 年 8 月 3 日）。〈歲朝賀闕〉，《叻報》（1889 年 2 月 11 日）。

22　見梁元生前揭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與公開徵聯寫作，以及使節評選鼓勵的方式，相互共感凝聚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參與。[23] 如此一來，我們理解十九世紀末在新加坡萌芽的文學空間，必須注意到一個經由使節教化形塑的主導意識型態。

這樣的意識型態，另外還有更具體的民間基礎。民間團體樂善社推廣社會服務，一般不出的賑災、捐藥、施醫等項目。除此還定期公開宣講《聖諭》，辦演講會，傳播中朝教化，在民間鼓動文化民族主義，避免「蠻夷化」。[24] 這些文化活動的舉辦，顯然跟使節推廣的教化獲得華人社會的支持大有關係。《叻報》社論曾公開表明，朝廷教化的意義，乃認知「海外之旅民，實中朝之赤子」，同時進一步揭示官方對海外華人的想像：「虔具衣冠，肅誠行禮，更可見其尊王之志，有民若此，正不獨中朝之福，亦正英國之福也」。[25] 換言之，啓蒙民智與忠於清室是當時並存的教化機制。而文學風氣與空間的營構，基本不出此格局。

儘管左秉隆主導的課榜詩題和文題顯得保守，基本不觸及敏感的殖民地政治或清朝複雜政局。[26] 但左秉隆出使在外多年，對西方世界「新事物」有所接觸，自己寫作的詩題，不免俗的總涉及諸如飛船、飛機、潛水艇、自來火等詩題，因此在課榜詩題部分，也難得以〈詠鐵甲船〉、〈咏氣球〉、〈觀中國戰艦有作〉爲題。詩界革命倡導的寫作新事物，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新加坡，也短暫成了風尚。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英語雄辯會 (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左秉隆面對大多效忠大英帝國和海峽殖民地政府的土生華人，仍以中國使節身份

---

23 王道宗主持的毓蘭書室，曾跟左秉隆的會賢社聯榜刊載報刊，營造更蓬勃的文學風氣。詳〈毓蘭書室聯榜〉，《叻報》（ 1889 年 4 月 15 日）。會吟社和會賢社也有聯榜的活動。

24 關於當時文化民族主義者感受的中國認同危機和文化運動的推廣，詳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 北京：中國華僑， 1991 年 10 月），頁 272-274 。

25 〈 樂善社宣講 聖諭恭紀〉，《叻報》（ 1888 年 3 月 3 日）。

26 見梁元生前揭文對課榜題目的整理。相關討論也可參考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94-9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組織一個討論政治、社會、文化議題的團體，意圖拉攏土生華人和華人上流階層的知識菁英，企圖心不小。土生華人在當地社會屬於少數群體，教育背景、語言政治和社交網絡都不同於華人移民。左秉隆是英文翻譯官出身，組織這類團體也許問題不大，但吸納英語背景的華人，應該不是使節份內首要工作。不過，他顯然清楚意識到殖民地政府在當地的長期佈局。英國人透過教育和政治管道培養當地土生華人菁英作爲治理華人社會的人選，而中國使節走入土生華人的交際圈，試圖影響或改變他們的國族和文化認同，大概要數左秉隆的英語雄辯會爲特例。（繼任的黃遵憲沒有延續）。但雄辯會舉辦幾年下來，則漸進改變和影響了土生華人的中華文化與民族認同。同樣是土生華人領袖的宋旺相在一八九三年從英國學成回到新加坡，日後撰述的《新加坡華人百年史》(1923) 爲此團體作了一些紀錄，並提到雄辯會的成員參與了領事館慶祝光緒皇帝大婚的官方慶典，公開發表肯定左秉隆的言論。[27] 換言之，左秉隆成功走入華人和土生華人群體，突顯了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在中華教化與殖民地認同中微妙的社會生態。

一八九一年左秉隆領事卸任歸國，當地報刊《叻報》登載華商聯送的敘錄，其中對左氏在異域施行教化的功績甚爲肯定：

> 叻地去中國者六千里，闢草萊者七十年。俗尚狂獰，人多渾噩，所謂勸懲弗至，痛癢無聞者。我公獨能齊之以德禮，繩之以範圍，懷之以寬柔，孚之以信義，而使闍中之士，翕然以從；化外之民，於焉以變者，一難也。[28]

這指出了早期的異域教化乃是文化播遷的基礎，文學實踐只是作爲附屬品。使節的責任在保護僑民，凝聚忠君的向心力，提昇當地文化水平。

一八九一年到任的黃遵憲將「會賢社」改爲「圖南社」，更以辦「文學獎」的方式，每月於《叻報》刊出題目，「初一出題，初十截卷，二十日放榜」，名列一二等者可領十圓獎賞，且不限《叻報》同仁報考。黃遵憲態度更

---

[27] 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年 5 月），頁 210-211 。

[28] 〈旅叻潮商聯送卸新嘉坡領事府左公屏敘〉，《叻報》（1891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積極和靈活，不但獎金加倍，課題也不像左秉隆以道德修身主題爲限。他「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學術」，[29] 尤其眼光轉向南洋風土紀錄。每月課題中，關於南洋的題目就有「新加坡風俗優劣論」、「巫來由文字考」、「禁賭禁娼」、「南方草木贊」、「新加坡草木雜詩」、「新加坡竹枝詞」等。例如對「南方草木贊」一題，甚至強調「凡中土所無之草木，有能作著色圖注出土名，過十種以上者，謝金五元，若能系以論說，再從優嘉獎。」[30] 言下之意，黃遵憲似乎在甄選草木圖鑑，興致勃勃的探究南洋華人社會與風俗地理。由此不難窺見他寫作〈番客篇〉、〈新加坡雜詩十二首〉的動機。這種南洋眼光的轉向，超越一般流寓者的去國憂思，進一步以使節的高度，關懷華人社會的內部議題，將焦點放在華人社會的基本生存的大環境。端看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的出題，在文章方面有〈問胡椒甘蜜近年價值驟減其故如何有何法可以挽救其詳陳之〉、〈擬新嘉坡捐建同濟醫院敘〉，詩方面則是〈新嘉坡海隄望月感懷〉。[31] 這明顯可見中國傳統士大夫入試的詩文格局，文以議論見長，詩以抒情爲主。換言之，圖南社除可視爲刺激文風的文藝沙龍，還保有中國傳統書院的特質，官員給流寓此地的文人應試的象徵性意義。在本土時事議題外，課題內容還涉及官方政策和離散華人的整體問題：「出洋華民日多，有倡議禁止出口者，是詳論其利弊」、「擬請派海軍保護出洋華民論」、「論生長南洋華人宜如何教養以期進益」等。誠如黃遵憲以「圖南」社名取自莊子大鵬南飛的典故，[32] 期勉社員大興文風，開啓南國的文學天地。藉此看出黃遵憲作爲出洋使節，官方視域已內涵海外華人的細部生活。

事實上，從當時報刊社論對左、黃二位領事主持文社的熱烈迴響，大體知

29 〈圖南社序〉，《叻報》（ 1892 年 1 月 1 日）。又見黃遵憲著，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頁 383-384 。

30 葉鍾玲：〈黃遵憲與圖南社〉，《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002 年 4 月），頁 53 。關於圖南社的課題題目，詳該書的整理和論述。

31 〈南社學規〉、〈南社臘月課題〉，《叻報》（ 1892 年 1 月 1 日）。

32 黃遵憲，〈圖南社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早期南洋華人社會貌似文化沙漠的結構性問題：「叻處南偏，距中國六千餘里，文墨稍優之士，絕少南來，即或有之，亦不過鴻爪雪泥，偶一留跡，其餘則半儒辦賈，文理頗通而已。」[33] 這是華人移民社會的基本結構，以勞動階層爲主體，且文盲者不少，只能仰賴南來文人士子的啓蒙與教化。稍有文化教養的移民，南來爲衣食奔波，自身已無餘力，也沒有太多文化資本進行文學表述，以致移民群體對使節推動教化頗多期待：「南來作客……將窮途落魄，何以自存，幸得該社獎賞之資，藉圖膏火，所得無幾，亦仍有所依脫」。[34] 恰是這一絲文學暖光，帶動了早期文學發展的氛圍。

開辦文社以促進教化，固然是使節任務。左、黃接續在新加坡開創的文社課榜，不但招來馬來亞地區士人的投稿，還吸引了緬甸仰光的閒來閣、映碧軒等文社寄來聯卷請求黃遵憲評閱。[35] 教化的初衷，卻帶出區域漢文學的某種交流形式。對於十九世紀的漢文學播遷脈絡而言，使節和文社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一八九六年移居新加坡的民間文人丘菽園也延續流風主持多個文社，可見這種由教化漸進帶有文藝沙龍雛形的文人結社，成爲新加坡早期文學發展的一種現象。其結社性質，不純然只是文人的酬唱風雅。在教化與文學的雙軌行進中，使節創立文社的傳統，既是延續斯文，也是華人移民社會的基礎需求——以教育爲根基的文化追求。

在文社的傳統之外，從左秉隆到黃遵憲，他們在領事職務之餘，漢詩寫作不斷。這些積存的文學遺產，紀錄著飄零絕域的教化經驗，當然也刻畫了異國風情，描述異地眼界。在推動教化的基礎上，使節領導創作的漢詩，爲境外漢學世界締造重要的漢詩庫，成爲晚清境外漢詩場域的其中一個亮點。

事實上，士大夫走向海外，不論是左、黃的使節身份，或如移居星洲的丘菽園等文人雅士，他們推動文化，以個人豐厚的文學實踐爲基礎，使得中國官

33 〈觀黃公度觀察獎勵學童事喜而有說〉，《星報》（1892 年 1 月 9 日）。
34 〈讀總領事黃大人圖南序系之以說〉，《星報》（1892 年 1 月 6 日）。
35 葉鍾玲：〈黃遵憲與會吟社〉，《黃遵憲與南洋文學》，頁 8-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視野下的境外南方在經濟軸線之外，開展出文化地理或文學地理的考察。但是，流寓者帶來的文學種子能否播種生根，他們的聲名和影響是否長存，顯然是早期馬華文學的隱憂。在這些漢詩作品裏，使節如何去紀錄華人形象，值得我們觀察。

二、「被發現的南洋華人」：使節與漢詩

曾有學者認爲，中國正式派駐使節到新加坡，從外交意義上可視爲「發現南洋華人」。[36] 言下之意，官方在南洋保護僑民、關心僑務，伸展外交權力的同時，已正視南洋華人的意義。不過，在清朝解除海禁政策之前，大清律法規令私自出海經商或移居海外者，都必須按律法處斬或服刑，等於視其爲罪民或逃犯。就算後來英法帝國跟清廷陸續簽訂條約，開放苦力貿易的移民方式，懲戒歸僑的舊例仍在執行。這些在海外遭遇剝削、染上毒癮、嫖賭惡習而無顏返鄉、終老淪落異地的華人苦力，在官方視野下成爲被遺忘的一群。至於稍能賺錢返鄉的華商或移民，在彼時海外華人返鄉不能合法化的情況下，他們返鄉屢遭地方官和鄉人敲詐和搶劫的事蹟也時有所聞。[37] 換言之，海外華人在現實意義上是不被官方認可的群體。因此，清廷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和派駐使節，對南洋華人而言等同於「祖國的承認」。從最初的叛徒、苦力、華人到華商，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稱謂的改變，代表了整體觀感和政策的轉移。[38] 而十九世紀末開始使用的「華僑」概念，可以有效說明官方在意識型態和法律意義上，確認了海外華人的移民方式和群體。「華僑」指涉的政治忠誠和民族主義，不論在

36 「發現南洋華人」最初是論者從中國外交史的角度討論設置使館和派駐使節對南洋華人的整體意義。詳 Godley, Michael R 前揭書。

37 呂士朋：〈清代華僑政策演變的經過〉，《華僑問題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國僑政協會， 1959 年 10 月），頁 107-121 。

38 見顏清湟：〈清廷對華僑看法的轉變（1644-1912）〉，華僑大學華僑研究所編：《華僑史研究論文集》（第一集）（廣州：華僑大學， 1986 年），頁 288-31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國或民國政府，都有其特定的脈絡和意涵。[39] 因此晚清設置領事，代表官方視野下一頁華僑史的開展。如此一來，「被發現的南洋華人」到底是什麼形象？這應該是境外漢詩寫作裏的議題。漢詩裏的南洋華人，既是地域文學區塊之一的馬華文學最初的構成形象，同時也是中國境外漢文學播遷的文學史議題。

晚清以降，陸續有成名的大詩人和默默無聞的文人等南來者以漢詩去描述南洋社會的華人群體。[40] 但做爲帝國代表的使節站在殖民地前線，他們漢詩裏的眼界卻值得推敲。「被發現的南洋華人」象徵了中國官方正式進入殖民地環境下的南洋華人社會。早期駐新使節開啓的南洋華人和風土寫作，最讓人感興趣的則是這些官方代表到底看到了什麼？所謂「被發現的南洋華人」，不在於南洋華人的歷史原初形象，而是透過使節眼界，他們有意識的去發現什麼？如何描述？如何對照他們的帝國和海外經驗？在今日看來，使節漢詩的南洋寫作雖然不算國情訪查或地誌調查筆記，但他們有意無意間卻試圖將「南洋景觀」帶入中原視域——離散華人的生活處境、殖民地的政治現實、傳統文化習俗與異域風土。這些恐怕都不同於官吏出訪西方諸國面對文明與文化撞擊經驗的書寫。恰恰相反的是，他們在中國古代地理觀念「天南」的「絕域」、「炎荒」，爲華人的跨境離散作了紀錄。在我們熟知的「瑰奇異境」或「歐亞新聲」的「文明」經驗之外，海外漢詩還有一個「離散」的向度。

無可否認，使節透過跟殖民地政府和華人接觸的機會，遠比其他流寓和移居者掌握更全面的客觀視野。同時相較其他文人的作品只能散落於報刊，在南洋史料裏聊備一格，使節卻有詩集傳世。在駐新外交官當中，稱得上是頂尖士

[39] 雖然「華僑」一詞在 19 世紀末的使用還不算普遍，但中國派駐領事卻是仿殖民帝國體制的現代建制。領事對海外華人的認識和保護，及其與西方帝國殖民政府的周旋，實已開啓「華僑的歷史」。關於華僑概念的討論，詳王賡武：〈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史〉，《王賡武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231-237 。

[40] 目前這方面較完整的資料整理和論述，詳李慶年前揭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夫詩人，也只有左秉隆、黃遵憲和楊雲史。[41] 其中左、黃二人是正式領事身份。左秉隆駐新時間前後長達十餘年，創作量也大，留下的南洋詩篇絕非黃遵憲可以相比。但前者研究者少，漢詩風格與創作的企圖心不大，詠詩自娛和酬唱作品居多，少有大手筆的長篇和聯章巨構。不像黃遵憲早已揚名晚清詩壇的身份，以史家手筆寫詩。但黃的南洋詩篇爲數不多，有學者指出其中若干應屬返鄉後追憶之作。這些雖是片段的南洋形象紀錄，仍頗具盛名，似乎說明了黃遵憲處理的華人形象已成新派詩的「詩史」場景，觸及複雜的華人大流徙時代。以今日眼光來看，黃的漢詩表徵的「南洋華人」值得探究。

作爲外交使節，黃遵憲寫詩的熱情持續表現在他海外經驗中寫下的漢詩。這些作品爲晚清漢詩的域外體驗，以及詩界革命主張的「新派詩」、「新詩體」留下了重要見證。[42] 新加坡作爲他十餘年外交官生涯的最後一站，此處乃英國殖民地、由大量文盲與少數士人組成的華人移民社會，明顯異於他在日本看到的「維新」價值，或美國、英國經歷的文明體驗。[43] 新加坡是當時最大的海外華人聚集地，中國近代史上熟悉的華工、豬仔、苦力等名詞，主導了南洋移民的管道和方式，奠定南洋華人以拓荒與勞動階層爲基礎的移民社會性格。

---

41 1908 年南來新加坡領事館任職書記兼翻譯官的楊雲史（1875-1941），本名圻，晚清唐詩派名家。停留時間長達三年餘，雖是領事館小吏，卻有置產南洋的計畫，投資橡膠園種植，組樹膠公司。民國後解職歸返，橡膠生意也失敗告終。著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1926），南洋期間寫作的詩詞百餘首。關於此人的詩詞，筆者另以專文討論。

42 錢仲聯認爲黃遵憲擔任外交官時期的「新派詩」精神，在於「濡染了東西各國的『文明』，認清了侵略者的面目」，因而「寫作了以新意境、新風格表現新事物的詩篇」。然而，以上較籠統的說法，並沒有注意到黃遵憲有意著眼「華人移民史」的寫作，已將這階段「新派詩」的內涵複雜化。見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前言〉，《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459-472 。

43 狀寫美國華工問題的〈逐客篇〉是一個例外。不過華工問題，從 19 世紀 50 年代以後早已是中國外交系統內的一項海外華人議題。〈逐客篇〉是在此脈絡下對相關議題的紀錄和呈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遵憲眼中的南洋和華人，含括了離散華人群體中最爲普遍的商賈、逃犯、苦力等階級，特別是這些人組成了複雜的海外華人移民社會。因此，當黃遵憲抵新後上書駐英使臣薛福成，他強調「南洋各島情形，流寓華人日增，所有落地之產業，沿海之貿易，華人佔十之七八」，並且注意到華人社會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包括船舶、財產、逃亡、拐誘、誣告等等與內地往來關涉的項目。[44] 換言之，黃遵憲意識到新加坡開埠，英國勢力進駐，華人移民社會組成，獨獨沒有清帝國的位置。總領事張羅僑務，僅僅只是服務華人社會，難以在異地外交上爲清帝國佈局。顯然黃遵憲在新加坡創作的漢詩世界，意識到了一個華人移民史的經驗書寫，將「新派詩」的意義推向一個離散詩學的複雜面向，促使我們思考使節漢詩的詩語言表述的影響和意義。

因此，在〈夜登近海樓〉[45]一詩，他「昂首尚照秦時月，放眼猶疑禹畫州」模擬昔日華夏之風南被的神州版圖，「記聞諸國賦海球」遙想帝國盛世時的朝貢外交。黃調動帝國想像，卻只能慨嘆「爛爛斗星長北指，滔滔海水竟西流」。南洋諸地北望中原已成過去，眼下已是西方勢力範疇。這些詩句當然已不能看做傳統的宦遊鄉愁，而是使節清楚意識到世界版圖疆域的變化，西方勢力與華人移民共同存在的南洋現實。詩雖屬小品，卻已觸及華人離散與變遷中的世界局勢。當〈夜登近海樓〉也成爲圖南社的月課詩題，或許黃遵憲也想知道當地華人是否跟他持有相似情懷。

黃遵憲到任兩年後，當初由他和薛福成爭取增設檳榔嶼副領事，成功取得英國外交部同意，以張弼士出任首位檳榔嶼副領事。二人薦舉張弼士，爲新馬華人社會帶來另一位影響深遠的領事官。張弼士透過優越的商業網絡，進入清朝的商業官僚體系，甚至成爲主管晚清商務的商務大臣，亦官亦商的領事性

44　黃遵憲：〈上薛使書〉，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頁 561-562 。

45　黃遵憲：〈夜登近海樓〉，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頁 577 。除特別註明，本文引述的黃遵憲詩均出自此版本。後文只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格，推動和影響了晚清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46] 不過，黃遵憲的領事性格顯然非常積極，他再度上書薛福成，提議在馬來半島增設副領事，有意擴大清廷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並進一步在民情與文化相通的情況下，拉近清廷與華商的關係。他根據馬來半島的大小白蜡 (Perak) 和石蘭娥 (Selangor) 的吉隆 (Kuala Lumpur) 等地是錫礦華人聚落，大量採礦企業家和工人生活於此，認爲「此雖系英人保護之土，各國尚未設官，然此處寄寓只有華民，並無他族，是中國設官，更屬名正言順。」[47]

使節眼光所及，固然有保護華人利益的考量，爭取擴大清廷的勢力。但華人身處殖民地，他們爭取靠山恐怕無法全仰賴使節，還有必須面對的殖民地政府，以及複雜的族群問題。黃遵憲有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頁 599-606）寓意了華人生存處境，卻同時看出使節立場的無能爲力。詩人駐新期間有大半時間因身染瘧疾，在修養中度過。此詩應是借居當地富豪佘家（應爲佘連成家族）養病時，觸目雜花滿樹而有靈感。詩以蓮菊桃李四種不同花種共養一瓶，隱喻南洋各種族共處的現實。全詩是長篇古體，從使節自身是養花者的視野，狀寫衆花心理和神態，以花喻人，試圖客觀捕捉一個衆花共處的環境，呈現殖民地各族雜處現象和矛盾。此詩向來受到注意，箇中用典和思想引起頗多議論。[48] 論者尤其指出，此詩將佛教的輪迴和現代科學技術結合，凸顯詩人熱切追求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知識的統一，看出其海外漢詩對典故取材範

[46] 關於張弼士的研究，詳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1893-1911）》（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陳鴻瑜教授指導，2004 年）。以及 Godley, Michael R. 前揭書的第四章 The recruitment of Chang Pi-shih (pp.79-93)。

[47] 黃遵憲：〈增設大小白蜡副領事稟呈薛使〉，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頁 562-563。

[48] 衆家對此詩的觀點以及賞析，詳蔣英豪：〈黃遵憲詩的新理想與舊風格：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析論〉，《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近代文學論》（香港：文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 12 月），頁 145-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圍的擴大。[49] 然而透過這首詩，我們同時看到使節眼界下已觸及到一個離散華人的核心問題——族群政治。但他頗爲特殊的處理方式，形構和處理的華人困境，值得檢視。

綜覽全詩，詩人刻意不直寫族群間的糾葛，只以一段詩句描寫花的心理轉折，似指向各種族遷徙移居到此，相處過程中的不同族群心態，以及存在的矛盾。試觀以下節錄：

> 一花驚喜初相識，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
> 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慚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
> 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
> 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
> 有時俯水嗔不語，誰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

詩語裏的「互猜忌」、「非我族類」、「同根煎太急」、「非種」、「他族來逼」意圖顯露，似已牽引讀者想像殖民地裏的種族政治。實際上，那些族群間的猜忌和排擠、階級壓迫和歧視已清晰可見。但全詩始終談花，不過是將可以發揮成詩史場景的敘事，轉化爲一組帶有閒適詩和哲理詩風格的作品。詩人既然有「足遍五洲多異想」的出訪背景，他藉寫詩揭露的多元種族雜處的矛盾，暗示了他試圖在詩裏尋找出路。接著，詩句轉而拉到一個大同世界的高度：「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以佛典思想的解釋，用無相抽換種族概念，呼應「合仙佛魔同一室」、「黃白黑種同一國」的必然處境。換言之，黃遵憲選擇一個世界種族不分貴賤膚色的理想狀態，去俯視現實中難以解決的族群問題。事實上，黃遵憲非常清楚現實的殖民地處境，華人面對強悍的白人殖民勢力，和馬來地域文化，箇中種族和文化矛盾顯然不小。但黃無意在此作文章，詩的終極精神反調動佛理概念的闡釋：「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

[49] 見施吉瑞 (J. D. Schmidt) 著，孫洛丹譯：《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137-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花不變爲人？」、「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道出花即人，人即花，將普遍可見的種族問題消弭在物我輪迴流轉，放棄我執的出世思想。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尾，也許更凸顯黃遵憲透視新加坡離散華人境遇中的無力感，和他進行的省思。全詩通篇花語，談的皆爲人事。黃談及詩的寫作理想境界：「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50] 言下之意，表明漢詩寫作擔負了承載歷史情境的義務。海外華人走入漢詩，已非單一個案的描述，而進一步以整體的華人歷史處境和形象，作爲黃遵憲漢詩寫作面對的「史」的時間，以新眼界試圖改變漢詩的傳統視域與腔調。這可能是漢詩世界內少見的海外華人的族群政治寫作。[51]

透過此詩，大體看出黃遵憲的使節眼光。佛理的出世，顯然是詩的解決方式，一種對大同理想的解釋。但人類種族因跨境遷徙而生的族群矛盾和階級問題，已是近代史的議題。我們與其讚揚黃遵憲表現渴望種族平等、大同思想精神，抑或對解決種族問題看到希望，還不如正視他刻意暴露自己身處異境，看到殖民地政府存在的種族壓迫。[52] 白人的優越和孤傲，對黃種人的壓迫和歧視，促使黃遵憲在詩裏體認到世界觀的大翻轉：「飆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科技和交通的發達改變了國界疆域，各種族共處已是必然的客觀現實和趨勢。黃遵憲走出帝國，深入異域，他的文明觀背後似乎已察覺境外移居、旅行和交流，改變的種族觀念也將在中國發生。如此一來，「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不也暗示順應潮流，種族跨境共處的事實已然在各地發生。黃遵憲向來被視爲晚清詩界「新理想」、「新事物」的實踐者，但他的「新」表現在南洋華人的觀察，卻是立足在一個「殖民地史」、「華人移民史」的向度。

另外，黃遵憲的名作〈番客篇〉（頁608-640）歷來被視爲重現華人移民

50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 3 。

51 馬華現代詩的寫作中，也有以花來隱喻族群政治的作品。田思〈盆栽〉、何乃健〈海棠〉皆以植物來隱喻華人族群的生存困境。

52 李慶年的解讀認爲此詩是諷刺英國人統治下的種族壓迫。詳前揭書，頁 10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詩史」，著眼其以民歌形式表現十九世紀末海外華人生活的歷史縮影。論者對〈番客篇〉如何透過當地華僑的婚禮描寫，以及華僑生活型態與困境來呈現海外華人移民社會和風俗已多所著墨，並進一步解讀出當時海外僑民的家國意識，以及使節的護僑愛國情懷。[53] 在這些論點之外，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黃遵憲貴爲使節，他以長篇敘事詩的形式鋪陳海外華人景觀，詩的背後潛藏了值得探究的詩人眼界的轉換。

〈番客篇〉以異地採風的民俗寫作開篇，細寫南洋土生華人的婚禮過程和各族賓客匯聚的場面。全詩用了頗長的篇幅進行敘事，意在描述南洋地誌，儼然客觀的採風者。（詳下節）然而各色人物登場以後，詩人的鏡頭轉向這些離散華人的生存歷史。透過賓客不同的行業，從漁業、海運、礦業、種植業、貨殖、甲必丹等等發跡的華人，詩人筆觸靈巧，寫盡暴發戶、投機者、資本家的不同嘴臉，已是華人拓荒史的縮影。本是一場婚宴，婚禮鏡頭外卻是百年來離散華人的謀生行業和生活景況。使節刻意挑明的華人背景，不流於泛泛之論，總是多了歷史的厚度。

因爲身在帝國使節和殖民地華人保護者的角色之間，黃遵憲眼下的「番客」更進一步道盡「番」民身份與「客」居的現實。他不但直指清廷政府海禁政策的錯誤，以及衍生的鄉人對歸僑的剝削和掠奪：「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鑊」、「堂堂天朝語，祇以供戲謔」，並同情華人異地生活的無根和邊緣處境：「譬彼猶太人，無國足安托」、「雖則有室家，一家付飄泊」。尤其生存在西方勢力底下的殖民地，勞動移民群體的文盲者，其終究無法表述自身的生存體驗：「一丁亦不識，況復操筆削」。而識字者，也在難以歸返祖國和西方權力階級的排擠之外：「識字亦安用？蕃漢兩棄卻」。這深刻透露出「番」在國境內外脈絡下被拋置的流離現實，「客」更非

[53] 見柯木林：〈黃遵憲總領事筆下的新加坡〉，《石叻史記》，頁 91-104 。黃炎子：〈黃遵憲〈番客篇〉等華僑詩述評〉，《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一期（ 1996 年），頁 20-24 。管林：〈黃遵憲與南洋華僑〉，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局， 2002 年 1 月），頁 35-4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般流寓者的「客感」、「客恨」。他等於深掘出埋身漫草山堆無名的移民群體，以及無法言及的飄零。學者黃錦樹曾指出「番客的客被發揮出一層更深的意涵：被雙重排擠而無根。」[54] 這恐怕是今日重讀〈番客篇〉的必備目光。

南洋華人在異地和中國之間複雜的離散狀態，呈現了我們當今談離散華人 (Chinese Diaspora) 的原初場景。於是，使節眼下「被發現的南洋華人」，是如此一幅景觀：遭漠視的移民勞動群體，華人教育的匱乏、無力護僑的中國政府、壯大的西方殖民勢力和優越的白人統治階級。換言之，這不是使節個人對華僑悲慘際遇的同情和關懷，而是使節在晚清時刻發現了一部「華人移民史」。

〈番客篇〉最後勾勒了這幅南洋流離景象：「近來出洋衆，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腳。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廓。華民三百萬，反爲叢驅雀。」在中國文學而言，海外華人的集體形象正式走入視窗。境外南方不僅僅是經濟和外交地理，而是人類學和社會學意義下文化遷徙，跨境離散的南方敘事。但黃遵憲的南洋書寫總究保留使節的想像：「誰能招島民，回來就城郭？」。在他的立場看來，使節擔負的使命就是文化播遷和宣教：「天道地氣，皆自北而南，而吾道亦隨之而南」。[55] 強烈的使命感之下，華人的歸鄉和忠清意識始終是使節南來的最終意義。

如果我們在黃遵憲詩發現的是一頁離散華人史，那麼更早抵新的左秉隆卻以使節個人情懷映襯了另一種的南洋華人面目。先後兩次派駐新加坡的左秉隆，最能看出使節勢力和華人社會之間的微妙改變。第一次任滿調職離開時，左秉隆有詩表達「聖主恩深多未報，使君轅去不須攀。漢家循吏推黃霸，看取聲威懾百蠻」（〈別新嘉坡〉），[56] 仍然相信和期許南來領事的威勢及功能。

---

54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爲等爲例〉，《海洋文化學刊》第四期（ 2008 年 6 月），頁 17 。

55 黃遵憲：〈圖南社序〉。

56 〈別新嘉坡七律二首〉，《叻報》 1891 年 11 月 9 日。又見左秉隆：《勤勉堂詩鈔》（ 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 1959 年），頁 129-130 。後引左氏詩作皆出自此版本，僅標示頁碼，不加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到了第二次駐新，已是一九〇七年。轉眼十餘年過去，清廷危機日益深重，左秉隆大概也知道自己接近末代使節。當時華人社會正處在保皇與革命兩股勢力當中，新加坡是兩派海外勢力活動的重要基地。領事所發揮的功能和意義顯然也在夾縫當中。他在〈重領新州七律四首〉（頁168）裏，多次出現這種忐忑不安的憂思：「漫云老馬途應識，任重能無顛躓憂？」或驚覺人事已非，情勢已變：「同來舊館人何在，獨宿空牀夢自驚。入戶淒淒風有怨，窺簾皎皎月多情。」當年左秉隆滿懷壯志首先上書薛福成，敦請提升新加坡領事爲總領事。然而改設總領事那年，自己卻屆滿調職，與高位擦身而過。如今再度派駐，雖是總領事的尊榮，卻有多少時不予我的感慨：「贏得頭銜一字榮，翻令心緒萬愁生」、「髮白蕭蕭愁看劍，可憐豪氣半消除。」使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殖民地政府和華人社會，同時還有革命黨人的伺機活動。領事因此還是清廷在海外的眼線，必須四處派出密使偵探，暗訪革命黨陰謀，報告朝廷。可見領事與華人之間的關係，已非往日融洽，或過去期待的官派教師。使節甚至還要公開勸諭華人各知自愛，不要資助逆黨，直接站在支持反清勢力華人的對立面。[57] 領事的無力感不僅於此，甚至有詩自嘲自己面對華人受侮時的態度：「世無公理有強權，舌敝張蘇總枉然。外侮頻來緣國弱，中興再造望臣賢。」（〈華僑有以受侮投訴者作此示之〉，頁176）箇中無奈，不言而喻。

事實上，左秉隆寫於新加坡的漢詩在論者眼中藏有一股感傷。[58] 他派駐十年屆滿離開之際，告別新加坡的心情卻是欣喜萬分：「幾度陳情未許歸，今朝喜氣動慈闈」（〈別新嘉坡〉）。這種歸心似箭的心情，也許摻雜了對調職失望的反諷態度。但在左秉隆第一次的十年駐新生涯，已有「久病妻如梅影瘦，初來妾似石頭頑」（〈嘆息〉，頁101）的家庭煩惱，更不說「出門落落誰知己」的寂寞無助。儘管貴爲使節，這種流寓者的生活憂患，實在跟許多南來謀生者無異。不幸的是，他最後還得面對異地喪妻之痛，他自稱「炎州冷宦」似

[57] 〈告示照登〉，《叻報》（1908年12月8日）。
[58] 見李慶年前揭書的說法，頁98-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已投射出自己出使絕域的諸多困擾和憂思。左秉隆的流寓心態，在某個程度上縮影了諸如康有爲流亡期間在大吉嶺喪子、檳榔嶼葬僕，許南英病逝異地棉蘭，甚至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失蹤亡故等等數不盡的喪亂。這些在異域環境的困蹇、耗損，一再說明了南洋華人的離散心事。

左秉隆潛在的漂泊感和自傷，可看做客愁。但客愁不完全只有流離哀憐的層面。一八九八年丘菽園主持的《天南新報》刊載民間文人蕭雅堂一詩〈有懷〉，讓我們重新思考南洋華人在南來心態上的複雜。

異鄉花草故園春，歸去來時只此身。安得多情似明月，夜來長照兩邊人。

故鄉消息問梅家，以客爲家又憶家。即使歸家翻似客，去來無處不天涯。[59]

詩的表面是客愁，但其中「夜來長照兩邊人」隱然指向華人地方感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s)，雙鄉的情懷似已呼之欲出。但詩人「即使歸家翻似客」又難以脫離黃遵憲〈番客篇〉所言的無根情境。因此「去來無處不天涯」已不純然解讀爲地理意義的離散，而是跨入「現代」境外的複雜感受。飄零與落腳何處，內部已有了不是歸返原鄉可以消解的新興異地感受。

簡言之，使節雖有基本的帝國意識和國家立場，但面對殖民地的華人生存際遇，多元種族和西方文明，詩所調動的舊典新語資源，及其處理的憂患、政治、世界秩序，見證漢詩播遷的離散大環境和歷史。恰恰是這些特質，改變了境外漢詩的格局。

三、絕域與風土：另一種離散敘事

使節南來有詩，這是他們在處理僑務和宣教文化之餘，對南洋社會的另一種生產。相對一般民間文人的寫作，使節對華人移民社會有崇高的象徵意義，對南洋華人文化／民族意識的建構和影響，以及對新馬華文文學的初步形塑，都不同於一般流寓者。使節長期與洋人和華僑接觸，有的具備外語能力，在他

[59] 蕭雅堂：〈有懷〉，《天南新報》（1898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自己的漢詩世界裏，難免從自我體驗形塑地方感，命名派駐地，或以民歌俚語入詩，嘗試描述一個南洋風土景觀。這是詩的文本空間移易，一種地理詩學的觀察，或使節漢詩的新理解。

上文提及黃遵憲詩裏呈現的南洋華人形象，顯然爲百年以前的中原漢詩世界留下一組帶有南洋風俗史和華人移民史意義的漢詩圖景。這些紀錄十九世紀末期新馬社會縮影的漢詩片段，也因爲黃遵憲的重要詩人身份，得以在其廣爲流傳的詩集中保留。對比穿梭在報刊、酬唱之間的無法成名的流寓文人詩作，黃遵憲南來詩篇因此益顯難得，有著更重要的意義。[60]

黃遵憲外交經歷豐富，異地生活養成的現代眼光，讓他意識到詩語言與經驗變革的意義。他寫於境外的漢詩多已成爲晚清時期「新世界詩」的典範。其中尤其以《日本雜事詩》影響最大，成就最高。[61] 同屬粵東詩人的丘逢甲稱其「詩世界之哥倫布」正好下了註解。黃遵憲出使日本期間還編撰《日本國志》探究明治維新的近代化進程，其寫於日本的漢詩同時展示了明確的文明制度關

---

[60] 歷來討論黃遵憲南遊詩的研究不少。代表性的論文可參考鄭子瑜：〈談黃公度的南遊詩〉，《人境廬叢考》（新加坡：商務印書館，1959 年 7 月），頁 79-88。王力堅：〈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第四期（1997 年），頁 115-120。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103-116。

[61] 關於《日本雜事詩》的研究成果甚多，可參考周作人、鍾叔河、實藤惠秀、鈴木虎雄等中日學者的討論。至於《日本雜事詩》的撰著刊行、內容題材和修訂等細節的整理，詳黃升任：《黃遵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四章。近人的重要研究，主要包括對《日本雜事詩》如何處理新語詞，對舊詩語和典故的運用和變換。見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漢學研究》第 22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299-323。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爲例〉，王瓊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 10 月），頁 251-292。至於黃遵憲「新世界詩」的相關研究，見張永芳研究黃遵憲的多篇論文。張永芳：《黃遵憲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0 月）。劉夢芙：〈吟到中華海外天：論黃遵憲的海外旅遊詩〉，《近現代詩詞論叢》（北京：學苑，2007 年 11 月），頁 182-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因此黃在三年多的駐新領事生活裏，以俗語和民間經驗入詩，將他眼中的南洋異地觀感，寫成〈新嘉坡雜詩十二首〉、〈番客篇〉等表現南洋風土名作，眼界明顯不同。面對海外華人的生活狀況，以及南洋地域的殖民地景觀，他選擇了一個表現士紳階層的視角，勾勒了使節眼中可以深入的華人形象和生活場景。這當中展示了生動靈活的詩歌形象，其中〈番客篇〉以長篇五言古體形式，從土生華人的一場婚宴、布置、飲食、擺設、服飾等生活日常細節敷衍敘事，以豐富多變的詩語言，表徵了南洋詩獨具特色的民間格局。如果採風者是我們對詩人的印象，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理解，黃遵憲意圖以地誌書寫般的敘事，面對他身處傳統地理概念下的炎荒絕域。

〈番客篇〉以一場華麗的土生華人婚禮作焦點，大概證明了他上書清廷時一再強調的南洋華人「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記，亦沿舊俗」。[62] 黃遵憲派駐期間接觸的華人領導階層，當然包括許多土生華人。尤其他自述養病期間住在佘家，推斷大概是當時潮籍領袖佘連城家族。而佘連城就是公認的土生華人典範。全詩從婚宴場合的外景寫到內景，細寫物質性的布置擺設，也描摹賓客風情。如此手筆，恰似一位客觀的民俗紀錄者，以日常生活的重要儀式，開啓了一個探究異地風土的窗口。全詩似乎刻意羅列和並置乍看矛盾和不協調的出場秀，卻又以歡喜的融合收尾。無論是音樂「庭下衆樂人，西樂尤鏗鏘」、「此乃故鄉音，過耳音難忘」，結果都「諸樂雜沓作，引客來登堂」。又或賓客群的「白人挈婦來，手攜花盈筐」、「蚩蚩巫來由，肉袒親牽羊」，收束卻以「余皆閩粵人，到此均同鄉」。詩人著眼中西元素並存、華洋雜處、族群互動，以寫實的華人婚禮，描述華人移居離散的環境。全詩長篇巨構，前大半就純寫婚禮細節，雜揉各式風俗寫作，如各族婦女露足、靸履、著襪等等粉妝打扮的模樣，爲這些異地情調寫作留下示範。這些南洋風光的凸顯，既有詩人獵奇目光，到底也是漢詩世界裏積存的南洋人文地理經驗。這些寫作特色，或許

62 黃遵憲：〈上薛公使書〉，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頁 563-5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少影響了後來丘菽園略帶豔情的感官式風土書寫。[63]

綜合而言，黃遵憲在〈番客篇〉前後轉換了雙重視角。開篇即透過客觀的風土紀錄，呈現日常華人生活儀式。後半轉向賓客背景以及華人生存困境的喟嘆，到底已是近代史的高度，暴露了他作爲領事的立場。〈番客篇〉的重要性是異於一般遊歷詩的格局，既有詩人鋪張域外體驗和人文景觀的開闊眼界，亦是綜觀時局、針貶外交的使節手筆，直視離散華人的總體環境。在此意義上，〈番客篇〉彷彿全景的長鏡頭調度，讓讀者進入到一種帶有南洋色彩的離散地誌寫作的世界。[64]

另外，黃遵憲尚有〈新嘉坡雜詩十二首〉（頁587-599）組成一組南洋印象。使節南來，接觸西方殖民者和在地原住民，構成他們域外視野的重要部分，絕域經驗。尤其使節與殖民地政府及華民護衛司往往諸多衝突，[65]到底也整合爲他的南洋視域：「家蓄獠奴段，官尊鴨姓奚」（〈新嘉坡雜詩〉其三），既調侃殖民地官員，也無法否認南洋各地「諸蠻盡向西」的趨勢。他寫作當地原住民，調動古代蠻夷西域古國名詞意象，描述在異地所見的種族和部落文化，竭盡以舊語言來揣摩異地神秘與地誌景觀：「飛蠱民頭落，迎貓鬼眼瞋」（〈新嘉坡雜詩〉其六）、「裸國原狼種，初生賴豕噓」、「人奴千十等，只願飽朱儒」（〈新嘉坡雜詩〉其五）。當然更少不了描寫熱帶物產如紅豆、芭

63 見拙作：〈流寓者與詩的風土：論丘菽園的南洋詩〉，發表於「『樂、生、怒、活：生活政治，風格運動與私衆社會』2008 文化研究會」，中國文化大學大衆傳播系、文化研究學會主辦，臺北：中國文化大學，2008 年 1 月 5-6 日。

64 不可否認，黃遵憲〈番客篇〉裏的華人世界仍屬士紳階層。但更多華工移民的生活卻是糾纏在華人私會黨和幫派之間，爲橡膠種植、錫礦開採等經濟利益械鬥，涉入鴉片吸食買賣、嫖賭的世界。大部分苦力落魄終老異鄉，爲求安葬與奠祭，只能寄存於下層苦力聚集的私會黨組織。可以想像使節對此華人境遇不免感慨，但漢詩寫作卻沒有聚焦於此。可見〈番客篇〉仍屬風俗、風土寫作，但後者已是赤裸裸的華工生活寫實，華人移民的精神史。使節漢詩終究隔閡，或無力探究。

65 其中重要的案例爲黃遵憲爲了制止私運鴉片而嘗試徵抽鴉片入口稅，在辦理洋藥憑單時引發了殖民地政府的質疑和衝突。詳葉鍾玲：〈中國駐叻總領事黃遵憲辦理洋藥憑單事件始末〉，《亞洲文化》第 25 期（2001 年 6 月），頁 168-1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蕉（「舍影搖紅豆，牆陰覆綠蕉」〈新嘉坡雜詩〉其十）、榴槤、檳榔、椰酒漿（「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側生饒荔子，偕老祝檳榔。紅熟桃花飯，黃封椰酒漿。」〈新嘉坡雜詩〉其十）。除此，在養病期間有閒適詩〈養疴雜詩〉十餘首，內容多是病中遊覽檳榔嶼、麻六甲、北臘（今霹靂）等地的蹤跡和印象。但詩人筆觸不凡，捕捉的地域形象清麗自然，箇中雅興，不忘紀錄異地風情和庶民生活樂趣：「分付馴猿攀摘去，渴茶渴酒正枯喉」（〈養疴雜詩〉〉其四）狀寫土人養猴摘椰的生活、「佛祖不如天使貴，勸余多誦可蘭經」（〈養疴雜詩〉〉其六）道出伊斯蘭信仰的社會風俗、「單衣白紿帳烏紗，寒暖時時十度差」（〈養疴雜詩〉〉其十二）仿馬來人的日常服飾裝扮、「異種名花新合樂，知誰金屋別藏嬌」（〈養疴雜詩〉〉其十三）更記錄風月趣聞，詩人自注說明這是中西妓女所生私生女，被富商納爲妾而金屋藏嬌。南方印象和生活感觸，組裝了文人地方感性，在某個程度上折射了漢詩寫作在境外的抒情張力和敘事意義。

在今日看來，這些都屬典型的民俗書寫。但恰是透過風土書寫，傳統印象中的南方絕域，在文學與文化生產的意義上，走進以中原意識爲主的漢人視域。黃遵憲的使節經驗，在替華僑社會服務之際，巧妙爲後人提供了一幅漢詩的南洋地景。黃在詩裏展示了自己的抱負：「草木南方志，虫魚後鄭箋」（〈新嘉坡雜詩〉補遺其四），他的使節工作志在走入僑民社會，而詩愈近風土而有狀寫南洋民族誌的意味。若漢詩是使節生涯的副產品，黃遵憲詩裏出現這樣的認知：「化外成都會，遷流或百年」〈新嘉坡雜詩〉其七）就應理解爲一種可稱爲「離散漢詩」的精神底蘊。因此，在民族國家未誕生以前，南來使節和一般流寓者的風土書寫，已屬他們跨境離散敘事的一部份。黃遵憲所言「海外偏留文字緣……吟到中華以外天」（〈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頁340），不再簡單視爲詩人個體的境外寫作，恰如康有爲流亡南洋期間遊歷爪哇，就忍不住高歌：「中華士夫誰到此，我是開宗第一章」（〈遊爪哇雜咏〉）。他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與使命，顯然已自覺的意識到自身的流亡是具體的現代經驗，已非傳統的流放與避地可以比擬。換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這些境外漢詩可以看做「海外華文文學」的最初概念與雛形，回到一個跨境遷徙的近代情境，構成我們書寫與理解各地華文文學無法略過的歷史脈絡。

不過，黃遵憲畢竟是短暫的流寓者。他寫作的這些南洋漢詩，未曾發表在當地報刊，也沒有直接帶動更多流寓詩人持續南洋的風土寫作。好比康有爲南洋詩裏蘊藏的帝國意識與創傷情結，流寓者的自身情懷仍是南洋漢詩的發展脈絡。那不斷複製的中原鄉愁與揣想中國政局的意志，主導了流寓者漢詩寫作的倫理。風土只是康有爲絕域的隱喻性寫作。因此在這些南來的重要詩人中，黃遵憲的寫作，確實在流寓者的去國離愁範疇裏，開啓了不同的可能。

相對黃遵憲的風土視野，左秉隆在新加坡多年，作詩不刻意著眼風土，卻足跡遍及馬來半島和印尼，詩題總難免觸及異地風光。諸如〈遊吉隆坡石巖〉、〈遊吉隆坡溫泉〉、〈遊檳榔嶼極樂寺〉、〈雪蘭莪途次作〉、〈遊廖埠〉，狀寫百年前的遊歷經驗，寫景亦抒情。但眞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倒是以息力爲題的詩作，描寫自己派駐十餘年的新加坡小島，反而有一種雅致的清優美感。甚至有學者指出以「星洲」命名新加坡，乃由左秉隆首創。雖然論者普遍以爲「星洲」一詞始於丘菽園創設。[66] 但學者指出左秉隆在一八八七年〈遊廖埠〉詩句：「乘興不知行遠近，又看漁火照星洲」。「星洲」之名已見。[67] 姑且不論左秉隆是否刻意爲此小島賦予「星洲」雅名，但此島嶼對左秉隆而言，總是意義深刻。

> 息力開新島，帆檣集四方。左襟中國海，西接九州鄉。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誰憐雲水裏，孤鶴一身藏。（〈息力〉，頁86）
>
> 南去亞洲盡，蒼茫孤島間。遊蹤羈舊吏，隔岸是新山。竹徑清風掃，柴門白晝關。數珠生老蚌，相對一開顏。（〈客息力作〉，頁86）

[66] 丘菽園對星洲的描述和命名，始見於丘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廣州：閩彰邱氏，1899年），頁24-25。他的晚年遺作〈星洲溯源談〉也提及自己在1898年「爲天南新報時所偶然命名」，顯然他更強調自己對星洲風土的關懷。該文見蘇孝先編：《漳州十屬旅星同鄉錄》（新加坡：僑光，1948年），頁13。

[67] 陳育崧：〈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年），頁47-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部重遊感易生，無窮詩思寫難成。郵船不為人留住，使節徒勞客送迎。
杯酒才聯今舊雨，河梁又話別離情，經過冷署頻回首，蝶去樓空樹半傾。
（〈舟過息力〉，頁168）

以上三首寫作時間不一，卻看出了左秉隆不同的宦遊心情。〈息力〉特寫星洲開埠後作爲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地理位置，卻又難掩自身派駐此異地的孤寂落寞感。〈客息力作〉、〈舟過息力〉已屬過客眼光，星島對於使節而言，人事已非。息力在這裏的韻味，特別彰顯出潛在的歷史變局。左秉隆前後駐守新加坡十四年，一九一〇年辭官後仍寓居此地。儘管使節過去對華人社會意義深遠，但時局變遷，漢詩裏的錯身體驗，爲南洋風土留下不同面貌。如果「炎州冷宦」左秉隆的星洲經驗是南來的流離和歷史的落寞，那麼對照以「星洲寓公」自詡的丘菽園，就是另一種的離散敘事。丘菽園詩集裏留有不少狀寫「星洲」，特別以「星洲」命名的詩篇。[68] 他著眼南洋地域的生存感覺，寫作風月紀聞、異族婦女的習俗，帶有文人風流趣味。除了寫作官能風土的遊戲之作，他也特別雜揉南遷歷史脈絡，爲星洲找到自身的書寫位置，突顯出他不同於一般流寓者的眼光。同屬南來文人，兩人不同世代（二人相差二十四歲，抵新時間也有十五年的落差）的星洲體驗，似也見證了絕域與風土的辯證意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左秉隆駐新期間，曾以使節身份受邀到柔佛皇宮作客。這些記錄當年馬來王朝宮廷景觀的詩作，雖然大體不出傳統狀寫宮廷華麗鋪張的風格，但一些異地風光的點綴：「杯盤星月皎」、「山徑踏玲瓏」也算是描寫了馬來文化在漢詩裏印象。

綺席開珠闕，金燈照玉賓；杯盤星月皎，酒肉海山陳；
樂奏彤階細，花鋪寶座勻；醉餘攜手去，滿户擁朱輪。
歸來夜正中，山徑踏玲瓏；報曉雞啼月，知途馬御風；
乍經村樹綠，遙見海燈紅；回首追歡會，華胥一夢空。
（〈夜宴柔佛王宮〉頁67）

[68] 這樣的詩篇不少，如〈新嘉坡地圖〉、〈星洲〉、〈星洲紀遇〉、〈星洲謠〉、〈星島〉、〈星洲晚眺〉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此，在南洋漢詩的風土世界裏，我們還注意到另一種形式的跨境風雅。許多中原南來的短期遊歷文人，他們寓居南洋期間，大量與當地的領事館官吏、報社主筆、私塾文人交際唱和，形成一股風氣，形塑了南洋文學的基礎形式。這種跨境交流可以成立，主要是南來者在南洋當地有關鍵的友人或引見人。諸如早期的左秉隆邀約蘇州常熟詩人衛鑄生和上海文人李鍾玨到訪。後來的丘菽園接待康有爲、丘逢甲、王曉滄等人。1887 年左秉隆上海的友人李鍾玨來訪新加坡，遊歷觀察異地風土，寫下了《新嘉坡風土記》一書。[69] 相對使節和文人漢詩裏的片段南洋景觀，此書以遊記形式記載了十九世紀後期新加坡的重要風土民情，成了觀察當時社會生活史料的重要文獻。而兩年後衛鑄生來訪期間，左秉隆也留下酬唱詩篇。[70] 雖然唱和詩篇難免應酬成分居多。但有時也寫出了在異地的生活景致：「鴃舌聽他蠻作語，鵝毛寫彼蟹行文。有時亦共鶴鸞偶，無事還追麋鹿群。」[71]

使節漢詩裏描述的自身異地體驗，多了與西方文化接觸的感受。由於他英文能力不錯，曾有一回參與當地英文報刊的英詩徵文。

> 泰西儒士百千億，能以詩鳴無幾人。我昔秉旌駐息島，西報徵詩題頗新。限韻更雜以蠻語，（韻腳一字限用巫來由語）許酬潤筆鼓吟身。我戲爲之聊遣悶，被人竊去獻班門。執牛耳者大加賞，贏得詩名報紙存。（節引〈戲作番詩〉，頁 56）。

這些難得的使節體驗，大體已是我們理解漢詩裏出現的南洋最爲眞切的風土紀錄。

---

69 李鍾玨：《新嘉坡風土記》（《靈鵝閣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

70 關於衛鑄生南來期間與當地文人的唱和現象，詳梁元生：〈十九世紀末期新加坡華人社會中之士人雅集〉，《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頁 31-49。

71 左秉隆：〈四疊前韻奉和鑄生詩伯〉，《叻報》（1889 年 11 月 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結　　語

綜觀以上使節投入教化與漢詩寫作的兩個面向，我們可以看到使節具備官方身份，肩負保護華僑利益，教化與傳達中華文化之責任，同時更是晚清帝國站在第一線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重要交涉、妥協與體驗者。以上經驗，對這些走出中國疆界且具備文人特質的使節而言，改變了傳統宦遊文學的格局，涉及更複雜的帝國使命和異域現代性體驗，刺激了對離散華人進行敘事和紀史的漢詩寫作。就此而言，左秉隆和黃遵憲以領事之尊，實踐了南洋的跨境酬唱風雅和風土地誌書寫，形塑了南洋早期的文學氣象。

然而，使節終究是南洋的過客。一九〇六年帝師陳寶琛赴南洋推銷漳廈鐵路股票，在新加坡有詩感慨這片南洋地理的文風氣象恐後繼無人，未能再見詩學大家。

天才雅麗黃公度，人境廬詩境一新。遺集可留圖讚稿？南溟草木待傳人。[72]

陳寶琛也是南來過客，他的〈息力雜詩〉帶出了中原流寓者的目光。星洲小島難得展現教化與文學光芒，這線南遷的香火，有誰賞識？又有誰繼承？使節已歸，晚清星洲熱鬧的詩文和名家文人往返的場域似有逐漸蕭瑟沈寂的跡象。看在這些南來詩人眼中，何時才能重見像黃遵憲這種深入南洋風土的大家？這其實點出了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陳寶琛對「南溟傳人」的呼喚，意指使節漢詩開啓的新意境和氣象，實屬南洋漢詩一環，對在地寫作者的期許，更揭示了近代漢詩文脈的南洋播遷路徑，指出以離散漢詩爲起點的生產情境，締造了古典時期的馬華文學。在另一層面，這也點出馬華南來文學的最初宿命：在使節和大詩人之外，我們目前所見的漢詩圖景又注意到了多少南方流寓者或移居者的精神面貌？事實上，作爲民族國家文學以前，馬華文學內含的華人移民史結

[72] 陳寶琛：〈息力雜詩〉，《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9 月），頁 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構，理應承接使節和南來文人留下的文學遺產。這片絕域風土不應再是過客眼光，而是區域漢文學播遷的一個歷史場景，境外漢詩的離散世界，馬華文學的重要起點。

（責任校對：陳建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告示照登〉，《叻報》（1908年12月8日）。
〈南社學規〉，《叻報》（1892年1月1日）。
〈南社臘月課題〉，《叻報》（1892年1月1日）。
〈旅叻潮商聯送卸新嘉坡領事府左公屏敘〉，《叻報》（1891年11月12日）。
〈新到各種奇書發售〉，《叻報》（1890年3月13日）。
〈歲朝賀闕〉，《叻報》（1889年2月11日）。
〈毓蘭書室聯榜〉，《叻報》（1889年4月15日）。
〈萬壽無疆〉，《叻報》（1888年8月3日）。
〈圖南社序〉，《叻報》（1892年1月1日）。
〈樂善社宣講 聖諭恭紀〉，《叻報》（1888年3月3日）。
〈課卷照登〉，《叻報》（1889年3月2日）。
〈讀總領事黃大人圖南序系之以說〉，《星報》（1892年1月6日）。
〈觀黃公度觀察獎勵學童事喜而有說〉，《星報》（1892年1月9日）。
清・丘菽園：〈星洲溯源談〉，蘇孝先編：《漳州十屬旅星同鄉錄》，新加坡：僑光，1948年。
清・丘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廣州：閩彰邱氏，1899年。
清・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年。
清・李鍾玨：《新嘉坡風土記》，《百部叢書集成》，第79輯，臺北：藝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印書館，1966 年，《靈鵝閣叢書》，第二函。
清・陳寶琛：《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9 月。
清・黃遵憲著，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10 月。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12 月。

二、近人論著

王力堅：〈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第四期，1997 年。
王振勳：〈晚清中國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的經濟考量〉，《興大人文學報》第34 期，2004 年6 月。
王賡武：〈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史〉，《王賡武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6 月。
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南洋學報》第63 卷，2009 年12 月。
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
呂士朋：〈清代華僑政策演變的經過〉，《華僑問題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國僑政協會，1959 年10 月。
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年5 月。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6 月。
青山治世：〈晚清關於增設駐南洋領事的爭論〉，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7 月。
姚　楠：〈中國駐新加坡首任領事胡璇澤的得官原因和政績評價〉，《南天餘墨》，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 年3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施吉瑞 (J. D. Schmidt) 著，孫洛丹譯：《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3 月。

柯木林：〈「我視新洲成舊洲」：左秉隆與新中關係〉，《南洋學報》第63 卷，2009 年12 月。

柯木林：〈左秉隆領事與新華社會〉，《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8 月。

柯木林：〈黃遵憲總領事筆下的新加坡〉，《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8 月。

柯木林：〈新華古典詩文選釋〉，《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8 月。

高嘉謙：〈流寓者與詩的風土：論丘菽園的南洋詩〉，發表於「『樂、生、怒、活：生活政治，風格運動與私眾社會』2008 文化研究會」，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文化研究學會主辦，臺北：中國文化大學，2008 年1 月5-6 日。

高維廉：〈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總領事考〉，《南洋學報》第11 卷第2 期，1955 年12 月。

崔貴強：〈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南洋學報》第29 卷第1 、2 期，1974 年。

張永芳：《黃遵憲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10 月。

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 (1893-1911)》，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陳鴻瑜教授指導，2004 年。

梁元生：〈十九世紀末期新加坡華人社會中之士人雅集〉，《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5 年2 月。

梁元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士」階層之分析〉，《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5 年2 月。

陳育崧：〈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椰陰館文存》，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

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11 月。

黃升任：《黃遵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8 月。

黃炎子：〈黃遵憲〈番客篇〉等華僑詩述評〉，《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一期，1996 年。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爲例》，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 年5 月。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爲等爲例〉，《海洋文化學刊》第四期，2008 年6 月。

葉鍾玲：〈左秉隆與會吟社〉，《中教學報》第27 期，2001 年。

葉鍾玲：〈黃遵憲與會吟社〉，《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2 年4 月。

葉鍾玲：〈黃遵憲與圖南社〉，《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2 年4 月。

管　林：〈黃遵憲與南洋華僑〉，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局，2002 年1 月。

劉夢芙：〈吟到中華海外天：論黃遵憲的海外旅遊詩〉，《近現代詩詞論叢》，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11 月。

箱田惠子：〈晚清外交人才的培養：以從設立駐外公館至甲午戰爭時期爲中心〉，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7 月。

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漢學研究》第22 卷第1 期，2004 年6 月。

蔣英豪：〈黃遵憲詩的新理想與舊風格：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析論〉，《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近代文學論》，香港：文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 (1877-1911) 》，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2 年10 月。

鄭子瑜：〈談黃公度的南遊詩〉，《人境廬叢考》，新加坡：商務印書館，1959 年7 月。

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爲例〉，王瓊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10 月。

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前言〉，《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12 月。

顏清湟：〈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年7 月。

顏清湟：〈清廷對華僑看法的轉變 (1644-1912) 〉，華僑大學華僑研究所編：《華僑史研究論文集》（第一集），廣州：華僑大學出版社，1986 年。

顏清湟：《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0 年12 月。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年10 月。

饒宗頤：《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年12 月。

Godley, Michael R. “China’s discove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p. 60-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